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 散论

任访秋 著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 散论



任 访 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扉页题字 邹宗绪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散论

任访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33,4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

统一书号: 10094·372 定价: 0.57元

目 次

鲁迅与晚清几个作者——严复、梁启超、章太炎…… (1)

试论晚清第二次文学运动…… (18)

试论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几次分化

——兼论鲁迅对分化的认识和态度…… (36)

鲁迅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对他的思想与创作的影响…… (48)

中国文学划时代的作品

——论鲁迅五四时期小说伟大的历史意义…… (58)

“革命文学”论争述评…… (71)

鲁迅论庄子…… (83)

鲁迅论章太炎…… (96)

鲁迅论钱玄同…… (108)

论鲁迅对敌斗争的战略与战术…… (124)

略谈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140)

不许借批儒评法歪曲鲁迅

——斥石望江《研究法家要古为今用》…… (153)

从“过客”中看鲁迅先生思想的发展·····	(165)
《希望》浅析·····	(177)
一篇具有浓厚诗意的儿童文学作品——《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	(182)
后 记·····	(187)

鲁迅与晚清几个作者

——严复、梁启超、章太炎

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之所以如此伟大，其根源为何？他的世界观以及他在革命同文学方面的方向道路，是怎样形成的？这确实是研究鲁迅者，所不应忽视的。就我个人年来对晚清几个作者的研究，并结合鲁迅在思想上同他们的关系，觉得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是严复、梁启超和章太炎三人。这三个中尤以章太炎为最。我之所以这样排列，是从鲁迅阅读他们的著作的先后时间来分的，下边试加以论述。

一 严 复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福建闽侯人，是我国最早派赴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他是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出国，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回国。由于他回国后在政治上不受重用，一直被投闲置散。加上当时甲午之役我国败于日本之后，订立了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一时举国沸腾。洋务派喧嚷多年的“富国强兵”的一套搞法，通过这次战争考验，宣布了彻底破产。于是应运而生的，是以康梁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

严复是一个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较深刻地理解，并且对中国学术，也有较系统的钻研。这时便以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进行对比，探讨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的原因，从而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今后救亡图存的方略，并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国际间的“生存竞争”与“弱肉强食”的客观规律。如果国人不急起直追，舍旧谋新，将来必不免于亡国而成为印度、波兰之续。于是，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震动一世的文章，这就是《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蔡元培曾概括地评论他这个时期的思想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最近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

严复在这个时期还译了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且在章节后边，就书中理论，结合世界形势与中国现实，发为危言深论，令全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道理；知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与列强竞争，彼优者常胜，而吾劣者常败，如不发愤图强，将难免于亡国之祸，这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确如一声春雷，不仅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影响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继《天演论》之后，严复又翻译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名著，如英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约翰的《自由论》及《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铨》、法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

在《原富》与《法意》的译文中，和译《天演论》一样，往往联系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以及风俗习惯等实际，进行批判，因而也对读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正由于严复掌握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对统治了中

国几千年的封建文物制度，进行了批判，并要求政府和人民迅速地舍旧谋新、改弦更张，因而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发聋振聩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同志把他放进清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士的行列。

鲁迅和严复处在同一个时代，但年龄却比严复小二十多岁，当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时，严复也在北京袁世凯部下任职。他们虽然并不相识，但鲁迅思想上，确受严复影响很大。

首先，鲁迅在青年时代最早接受的西方思想，并对其世界观影响最大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这正是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的结果。后来，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了更进一步的钻研，并且发表了《人之历史》及《科学史教篇》等论文，从而树立了他在前期以进化论为主导的世界观。

“进化论”思想，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极大，除了顽固派以外，一般主张改革的进步人士，不论是早期的维新派，和后来的革命派，很少不受其影响的。即如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的孙中山、章太炎等。鲁迅接受“进化论”之后，即以此为武器，来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中保守主义与复古主义，进行了抨击。他在一九〇七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即对老庄、孔子进行了批判，并且指出：“而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折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这是在晚清的时候；到了“五四”前后，鲁迅更是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当时种种的黑暗现实——从封建的文化到腐朽的政治，以及不合理的风俗习惯，进行了一系列地揭露与抨击。

其次，严复在戊戌前发表的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思想与政治制度的时论，而提出向西方学习。学习的对象，主要是

民主与科学。他在《救亡决论》和《论世变之亟》中，提出“自由”“格致”（即科学）为救国之本。这在当时虽然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对解放人们的思想来说，还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的。鲁迅当时深受其影响，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又在提倡复古读经的时候，鲁迅一次在答《京报副刊》问的时候，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应该说这种思想，是在严复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严复在介绍西方学术名著如《天演论》、《原富》和《法意》中往往附以按语，根据西方的理论与措施，对照中国的现实，提出自己尖锐的批判，语言是极其沉痛而愤激的。这种短文，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政论性的杂文。用瞿秋白的话说，是“战斗的阜利通。”鲁迅的杂文应该说也是受到严复这类作品的影响的。直到一九一八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中，还提到严复所译《法意》的《按语》中谈到在街道上看见中国儿童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所产生的对他们将来的忧虑。鲁迅说他到北京后，这种情况并未改变，因而也产生这样的忧虑。接着说：“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锐敏的人。”（《热风》）

四，严复对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是非常审慎和认真的。他译《天演论》时，为自己定下“信、达、雅”这三个标准。他说他在确立名词上，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天演论》的翻译是意译，但他并不认为这是翻译的正规，他在《译例言》中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悖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

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所以严复以后所译各书，就不再采取这个译法。鲁迅在给瞿秋白讨论翻译的信中，曾对严译有着较全面的评述。首先他说明了严复最初所以要用古文来译《天演论》的原因道：“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又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可见鲁迅对严译是如何的熟悉，并对他的译书方法与佛经的翻译进行比较，所以能得到这样肯定的结论。瞿秋白在给鲁迅信中，把严译与赵（景深）译相提并论，一概予以否定。鲁迅就马上指出：“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上的认真审慎精神，应该说是受到严复的深刻影响的。

三十年代，鲁迅在评论刘半农时，曾提到晚清的几位名人，拿他们的晚年情况，来与他相比说：“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

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这对他们思想的停滞不前，因而被反动派利用，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二 梁 启 超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八），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很早就追随康氏，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一八九六年，在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办《时务报》，专任撰述，发表了《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宣传维新变法。不久，应陈宝箴之聘，主持湖南时务学堂讲席。

一八九八年，在维新运动中曾被载活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由于清廷顽固派对维新派进行镇压，六人死难，梁启超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赴日，从此开始流亡生活。同年十月即创办《清议报》，一九〇二年创办《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杂志。一九〇五年大倡君主立宪，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所倡导的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同《民报》进行论战，终以违反时代潮流，遂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后，他混迹于军阀官僚间，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一九一八年，欧战告终，赴欧游历，著《欧游心影录》。一九二六年，讲学于清华研究院，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卒于北平。遗著有《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是晚清提倡文学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在诗歌方面，他曾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倡“诗界革命”。他盛赞黄遵宪的诗作，认为是“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同时他又特别表扬他的《出军歌》四首，说它“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而文藻亦两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

在散文方面，他的作品是当时解放了的散文的典范。他曾评论自己的散文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

特别是在小说戏曲方面，过去具有正统派文学观的人，是鄙视小说和戏曲的，直到晚清仍然如此。梁启超因受到西方文学论的影响，尤其是他要从事政治上的改良运动，在启发群众的思想、提高群众的觉悟上，认为小说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在办《清议报》时，即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后来，又发表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刊行于一九〇二年发行的《新小说》杂志中，同时他又带头写小说和戏曲，如《新中国未来记》、《新罗马传奇》、《劫灰梦传奇》等。

梁启超非常强调小说的作用，抬高小说的价值，他认为小说有四种力，即熏、浸、刺、提，因而它能卢仝（牢笼）一世，亭毒（化育）群伦。宗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组织政党，莫不赖之。此外他还认为于日本维新之道有大功者，则小说亦其一端。（《传播文明之利器》）正因为如此，他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根据以上各点，可以说梁启超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

鲁迅到南京读书时，正是戊戌变法那一年，他当时就接触到了梁启超们所办的《时务报》，并读到了严复译的《天演论》，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从他的本家长辈批评他的话，就很可以说明。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曾这样写道：“‘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到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记不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很显然，这时的康梁变法运动可能已经失败，但鲁迅当时的思想已受到他们的影响，并且可能表现在平时的言论上。所以才引起本家长辈对他的教训，并让他抄读顽固派官僚弹劾康有为的奏章的。

鲁迅于一九〇二年三月赴日本留学，就在这一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鲁迅当时就订阅了这些报刊。

在文学观上，尤其是对小说的看法上，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是很清楚的。据周作人《鲁迅在东京时的文学修养》中说：“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

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知堂：《鲁迅在东京时的文学修养》）

周作人又说：“癸卯（一九〇三）年二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借看到了。不过民族革命运动逐渐发展，《新广东》《革命军》公然流传，康梁一派立宪变法一派随之失势，但是对于我们《新小说》的影响，还是存在，因为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工作，乃是一个缺陷。《新小说》上登过雷俄（雨果）的照片，就引起鲁迅的注意，搜集日译的中篇小说《怀旧》（讲非洲人起义的故事）来看，又给我买来美国出版的八大本英译雨果选集。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鲁迅与清末文坛》见《鲁迅的青年时代》）

由周作人这两段话看来，鲁迅受《新小说》的影响是多么大了。同时也可以看出鲁迅文学观的发展情况。首先，由于梁启超的关于对小说的两篇论文，阐述小说的巨大作用，并提高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这就引起了鲁迅对小说的重视。其次由于《新小说》中介绍了外国的一些政治小说，为《十五小豪杰》、《经国美谈》及科学幻想小说《海底旅行》这也促使了鲁迅从事于政治小说与科学小说的编译。前者如在《浙江潮》上发表的《斯巴达之魂》，后者如他译的《月界旅行》，并附有《辨言》，倡导科学小说，申述利用文艺形式介绍自然科学的好处。这部译著由东京进化社出版。后又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地底旅行》（首二回载《浙江潮》第十期）；全书后由

南京启新书局出版。《北极探险记》（稿已佚）。这种观点，后来又由于进一步接触到欧洲文学，看法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认识到文学与国民精神的密切关系。到了一九〇六年，决心离开仙台，弃医就文，要从事文学运动了。他这样做的动机正如《呐喊·自序》中所说的“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指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课堂上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影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文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介绍了东欧的小说，印行了《域外小说集》，同时在一九〇七年发表了《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介绍了西方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如拜伦、雪莱，显克微支、裴多菲等。这种文艺思想，正如周作人所说的：“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一派的。”可知在文学观上鲁迅最初曾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后来又逐渐有了进一步地发展。

三 章太炎

章炳麟（一八六七——一九三六）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后因仰慕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为人，改名绛，别号太炎。幼年从他外祖父朱左卿读书的时候，就听到了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顾炎武关于民族思想的言论，后来又读到《明季稗史》十

七种，因而这种思想就更加蓬勃发展起来。

一八九二年从德清俞樾问学，他一面治朴学，一面关心社会政治的发展情况。一八九五年，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由于他曾参加康梁等发起的“强学会”，和参与梁汪等举办的《时务报》编辑工作，所以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被株连，不得不逃往台湾。

太炎在戊戌前，政治主张也是改良主义。从他写的《变法箴言》，和称清帝为“客帝”，都可以说明。戊戌变法失败后，特别又经过庚子事变，使他深刻认识到清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因而坚决地进行排满活动。不久，他去日本，因得与孙中山相识。一九〇三年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为邹容《革命军》作序，昌言革命，并为文驳斥康有为在《与南北美诸华商书》中提倡保皇、攻击革命的谬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于《苏报》，因而被捕入狱。

一九〇六年上海出狱后，即去日本。这时他参与领导的光复会已于前一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联合，改组为同盟会，发刊《民报》。他到日后，即主持该报的笔政，与当时主张改良主义、提倡保皇的康梁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持续了长达数年之久。最后革命派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改良派的幻想，给辛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篡窃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太炎因反对袁氏遂被幽禁。直到袁氏垮台，才恢复自由。晚年定居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所”，成为一个闭门讲学的国学大师。一九三六年六月卒于苏州。著有《章氏丛书》及《续编》等。

鲁迅从章太炎问学，是在一九〇八年，当时是在东京。太炎逝世后，鲁迅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曾追述他当时所以去听讲的动机，是因为佩服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他们分别了，但一直保持着师生的情谊。据景宋的回忆，鲁迅对太炎“是很尊重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当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公推先生（指鲁迅）亲自到监禁的所在，婉转陈词，才进食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太炎逝世后，鲁迅当时身体已很不好，但是病中还力疾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来纪念太炎，并对他进行了中肯地科学地评价，这都说明鲁迅对太炎是如何尊重和敬佩了。

鲁迅生平在思想学术上受太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精神。鲁迅在评价太炎时，特别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具体地说明与发挥。他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下边他从自己亲身感受上给以证明，写道：“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箴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献策）的×××（吴敬